

大学旧踪 DAXUEJIZONG

大学旧踪

谢泳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旧踪
JIZONG

大学 (旧) 踪

谢泳著

江西

教

育

出

版

社



大学旧踪

谢 泳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省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330003)

URL: <http://www.jxeph.com>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南昌市丁公路 120 号 330002)

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装订

(江西省南昌市洪城路 636 号 330009)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24 开本 6.25 印张 插页:2

135 千字 印数:1 - 5245 册

ISBN 7 - 5392 - 3128 - 9/G·3048 定价:11.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这本《大学旧踪》是我在研究西南联大过程中的一个偶然尝试,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我接触过一些有关老大学的原始资料,在读这些东西的时候,说实话,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在这些原始资料中看到的并不是枯死的过去,而是一个活生生的让人长叹不已的从前。这是我的前辈们的过去,这是我的前辈们的大学生活。近年我经常和一些朋友说,我们所努力争取的许多东西其实并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我们前辈曾经的现实,那不是一种理想的生活,但那生活中有理想的东西;有让人感到希望的前景,我们的前辈为了追求更理想的生活,对已经成为现实的理想是比较淡漠的,也许这正是人们常说的得到的东西就不显得珍贵了。在过去的大学里,有过丰富的校园生活,有过教授治校的漫长岁月;演讲是自由的,讲课是自由的;没有统一教材,不必讲自己不愿讲的东西;学生可以批评教授,教授也不怕得罪学生;教授是自由流动的,不用看校长的脸色,合则留、不合则去;职称是真正的学衔,由校长说了算,真有水平,没有学历也可以,在这所大学是教授,在另一所大学可能你连一个助教也当不上,没有终身制,没有铁饭碗。那时的教授和学生也不满意他们的生活,他们依然在为更高的理想而奋斗。这一切后来都消失了,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是有人不愿提起从前,但成为历史的东西哪里是能轻易抹去的,不过是尘封在记忆中而已。中国现代大学的过去已是一个旧故事了,但人们有时还想听一听,怀旧永远能

让人产生联想的。我不是讲这个故事最合适的人,或者说我根本就没有资格来说这些往事,我只是从文献中打捞了一点被岁月剥蚀的生活而已,这只是旧日生活的一个点,让我们先从这一点一滴的旧人旧事开始,去感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吧。

作 者

1998年4月6日于山西太原南华门东四条

目录

前 言	(1)	识大体的教授们	(41)
大学的起点	(1)	教授的自由流动	(43)
清华历史系的转型	(3)	教授情谊	(45)
清华学风	(5)	教授的自由	(47)
大学里的自由演讲	(8)	西南联大的“十一学会”	(49)
学人论政	(10)	教授给学生翻译论文	(52)
叶恭绰长交大	(12)	教授的境界	(54)
教育原来在清华	(14)	教授之间	(57)
梅贻琦的名言	(16)	教授的新与旧	(59)
反对统一教材	(18)	教授的年龄	(62)
校长保护教授	(20)	教授的工资	(64)
冯友兰对学生的情谊	(23)	教授至上	(66)
清华有正气	(26)	教授的上书传统	(68)
胡适当校长	(28)	学生与官员	(71)
胡适帮助吴晗	(31)	学生批评教授	(72)
胡适关心千家驹	(34)	竺可桢爱惜青年	(74)
校长的合作精神	(36)	张寿镛爱护学生	(76)
清华的校园民主	(39)	毕业论文	(78)

蒋梦麟的一件旧事	(80)	金岳霖的三个学生	(112)
蒋梦麟的良苦用心	(82)	外人对北大的印象	(115)
蔡元培发现梁漱溟	(83)	北大的两种教授	(117)
朱自清劝说王力	(85)	北大校长难当	(118)
闻一多雅号“何妨一下楼主”	(87)	北大教授与学生	(120)
闻一多提携陈梦家	(89)	师生之争	(122)
闻一多治印	(91)	当年费孝通	(125)
顾颉刚慧眼识钱穆	(93)	刘文典顶撞蒋介石	(127)
顾颉刚眼中的学生	(95)	张东荪有傲骨	(129)
西南联大出诗人	(97)	张奚若的士气	(130)
查良铮旅途背单词	(99)	陈寅恪的气节	(131)
韦卓民与教会大学	(101)	考题与论题	(132)
校长的办公室	(103)	陈序经不入国民党	(136)
校长夫人摆地摊	(105)	萧公权不做官不入党	(137)
北大进德会	(107)	洪业向校工道歉	(139)
金岳霖的名言	(108)	钱端升的一个学生	(141)
金岳霖的雅谑	(110)	安福三才子	(143)

大学的起点

大学的起点



蒋梦麟

大学旧踪 · 1 ■ 大学的起点

我已经多次说过,中国现代大学的起点很高,因为她从一开始就走的是一条正路,中国现代大学的理念是很现代的,如果能不间断地走下去,会有一个远大的前途,可惜弯路太多。中国的大学为什么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呢?因为最初办大学的人有现代的眼光。中国的许多事情其实从一开始是有上了轨道的,比如海关、邮政、盐务、铁路、现代银行和大学,本来起点都不低。蒋梦麟在其著作《西潮》中说:“这些成就可以说是依赖外国协助而来的。但是我要请问: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西潮》第154页)大学更是如此,蒋梦麟认为,中国现代的大学除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外,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抗战期间,因为物价飞涨,教授生活非常清苦,但是他们始终辛勤工作,力求维持学术水准。绝大多数的学生,在教授和大学当局的良好影响之下,对于如何诚实而有效地运用公款,也自然养成正确的观念和好的习惯。蒋梦麟过去做过教育部长,做过北大校长和西南联大的常委,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之一,他对中国初期现代大学教育的评价,应当说是公正的。今天受过旧大学恩惠的人已经不多了,那些健在的老人每当回忆起过去的时光,都十分留恋,可见过去把旧大学说得一无是处,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清华历史系的转型

清华历史系的转型



蒋廷黻

中国现代大学的历史并不长,但她的转型却完成得较好,中国的许多事情,其实也并不像有人想的那么难,只要制度好,有些事办起来是可以成功的,至少中国的大学教育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范例。蒋廷黻在他的回忆录中述及当年在清华历史系的经历,就很给人启发。蒋廷黻初到清华时,清华历史系基本上还是传统教法,蒋廷黻是学过现代历史研究方法的学者,他从美国回来以后,

就想用这种现代的方法来改变清华旧的历史教学方法,很快他就成功了。他回忆说:“渐渐的,我认为我应该放弃这批旧学者。我要把他们当做我个人的老师。我希望他们能在我身边,以便请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来教历史。在教书时,他们能够告诉我们中国从什么地方发源,又向何处发展,最后定居在什么地方。我不声不响地引进一批年轻教授代替原来的老教授。一点麻烦都没有。我予新人充分的时间。我说:‘现在努力吧,准备开一门课,那么,就是清史吧,你有兴趣吗?你知道清代的大问题吗?努力吧,我会供给你参考书、助理人员和时间。同时为了生活,你必须教一点其它课程。你愿意教什么都可以,但你必须在两三年时间内准备开一门新课。’我引导这批年轻教授开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点也没有引起麻烦和反对。如果不是因为战争爆发,我们能循此途径继续努力下去的话,我坚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内清华的历史系一定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全国唯一无二的历史系。对这些政治及社会科学的观念,同仁们常常交换意见。很幸运,校长和评议会都同意我的作法。因此,拟定一套适合中国学生的课程。如果有人有兴趣比较一下清华 1929 年与 1937 年的异同,他一定会发现在课程方面有很大的改变。此举,我认为是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我一直为此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方面曾略尽绵薄。”(《蒋廷黻回忆录》第 124、125 页,台湾传记文学版)从蒋廷黻的回忆中我们能够感到在老清华,也不是什么都是西方的好,他们也在努力使好东西能和中国的实际结合,传统和现代其实并不是绝对对立的,特别是对像教育这样的问题,没有必要夸大中国和西方的差别,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了很强的创造性,这种创造性的特点首先是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一个相遇即融合的过程,好坏一望而知,好东西在哪里都好,教育是这样,其它又何尝不如此呢?

清华学风

清华学风

国内学术界近年很注意对“清华学派”的研究,清华徐葆耕先生还出版了专著。王瑶先生生前也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清华有无学派,这个学派是怎样产生的,它的特点是什么,这个学派是仅指人文学科还是包括自然科学,是和清华发生过关系的学者都属这个学派,还是有相对固定的区别标准等等,总之这是一个三言两语说不明白的问题,我以为说学派难,而说学风易。那么清华的学风是什么呢?从制度层面说,一是教授治校,二是学术自由,这两条是一个大学学风能否具有现代色彩的基本前提,老清华是做到了这一条的。老北大也做到了这一条,那么清华和北大怎么区别呢?这是一个



清华国学研究院教师

前排左起:李济 王国维 梁启超 赵元任

问题。从大学自身的发展看,北大是由京师大学堂演变过来的,而清华是由留美预备学校转变过来的,也就是说,清华是直接与现代大学接轨的,而北大则是由传统学堂过渡到现代大学的,简单说,北大是由旧到新,而清华本来就是新的,这是一个特点。清华在建立大学之前,先建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这是1925年的事,1928年清华才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再加上吴宓和李济,从教育背景上说,是完整的中



姜亮夫

西两面,全部出过国门,对中西学术都有深刻的了解。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历史虽然不长,但这个中西两面的传统对后来清华学风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姜亮夫先生回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生活,就特别强调这里的西方文化特点,他说:“从赵元任先生那里,我也得益非浅。他讲声韵学,讲法和我在成都高师听的课完全是两回事,成都高师的先生讲的是声韵考古学,而赵先生讲的是描写语言学(用印度、欧罗巴语系的发音方法运用到汉语的声韵学中来)。不过我还是认真听,并把描写语言学和声韵考古学对照得到很大启发,这方面得赵先生之力,是我一生学问基础的关键。”(《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集林》第1卷第239页)姜亮夫先生对赵元任先生的这个评价也可以说体现了中国现代学术和西方学术结合的发端,清华的学风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形成的。姜亮夫先生说,清华研究院的教和学,确实在德、智、体三方面兼顾,尤其那时的学风特别好。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讲脏话都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

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同上,第243页)。姜亮夫先生晚年的回忆也许有些感情色彩,但不管怎么说,清华当年的学风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是起了很大作用的,没有好的学风,也就没有现代的学术,有了清华的学风才能出现“清华学派”,清华大学由于在起步阶段恰好是由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代学者开创局面,所以清华的学术传统也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传统。

大学里的自由演讲

大学里的自由演讲

自由演讲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自由演讲的前提是校园应当有传播思想的自由和责任,自由演讲是大学教育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很难设想一个没有自由演讲习惯的大学能够是有生气的。自由演讲的主体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他们应该养成表达不同学术和不同思想的习惯,因为大学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学会谋生的技能是第二位的事情,而要养成健全的人格,光在专业课堂里学习



张美若

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旧大学里是养成了这种风气的,那里的自由演讲是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弥漫在校园中的,许多人怀念旧大学的时光,就是怀念校园中那种自由的空气,当然那不是绝对的自由,但却有着较为宽阔的追求自由的空间,至少在追求自由的时候,大家的恐惧感要少一些,我们还是来看看当年一个教授演讲的风格吧。1946年初在旧政协召开之前,张奚若应西南联大学生会的邀请,在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发表过一次演讲,讲题是《政治协商会议应解决的问题》,其中心是“废除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历时两个多小时,听众达六七千人。演讲开始前,张奚若大声说:“假若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在一阵笑声后,他开讲了。他说:“现在中国害得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接着他提出了两个医治办法,“第一个办法是理想的办法,可以笼统地说:彻底澄清政治上的恶劣空气,改变作风态度、纠正错误方向,不能再向死路上跑去。怎样才能纠正过来呢?”“就只有彻底废止党治”。并提出如下办法:“第一,为国家着想,为蒋先生着想,我劝他下野”,第二“就是组织联合政府”,第三“惩办反动分子”,第四“召集宪法会议”,制定宪法。他还说另有“一个较为现实的办法”就是“也要结束党治,结束训政,不过还可以让蒋老先生留下来”,但不得再一人专权,“必须有许多人负责”(《张奚若文集》第17页)。这是50多年前一个大学教授的演讲,我们先不说他所讲得那些内容,就说那演讲的风格,演讲时的自由心态,就可以想见当时校园内的自由空气,中国大学的民主气质,就是在这样的空气中漫漫生长起来的。

学人论政

学 人 论 政

学人论政是一个老话题,本来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但这个说法,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旧大学里教授有论政的习惯,所谓论政,不是几个人私下里说说而已,论政的基本含义一是能否公开说,二是能否在刊物报纸上说,旧大学里这也是一个敏感的话题。1944年,昆明各大学师生举行过一次纪念七七事变的座谈会,许多教授都在会上发了言,当时云南大学校长是数学家熊庆来,他是不主张学人论政的。他讲了三点,第一点,他认为这次座谈会是学术性的,是寓纪念于学术讨论的,所以他才参加。第二点,他认为中国的积弱是由于学术不昌明。第三点,要救中国的积弱,要昌明学术,我辈做师生的人就应当每人守住他的讲求学术的岗位,孜孜以赴之,而不应当驰心于学术以外的事物,例如政治、商业之类。对熊先生的这个看法,潘光旦先生就有不同意见,他说:“——学人论政之风虽至今没有达到一个十分自由的境界,舆论与清议的不可侮,却始终是一历史的一大事实。”(《潘光旦文集》第5卷,第500页)然后潘先生讲了明代顾炎武的故事。他说:“学人论政是中国文化的一大传统。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不一而足。在近代史上最值得我们钦仰的一个是顾亭林先生。明社既亡,亭林先生到昌平哭陵三次。亭林先生是一位学术家,是明末清初的第一位大师,但哭陵不是学术性的,明社虽亡,他的学术仍在,他哭陵则甚?他的三位外甥在新朝做了大官,他到一次北京,总要督责他们几句,对那位声势最喧赫的大外甥尤其是不肯